

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走进大师

旧影

JUYING

一代孤高百世师

YIDAI GUGAO BAISHISHI

刘琅 桂苓 编

胡适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设置，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犹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也从不讳言他喜欢有教训的口吻。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他的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旧影

JIUYING

一代孤高百世师

YIDAI GUGAO BAISHISHI

刘琅 桂苓 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影：一代孤高百世师/刘琅，桂苓著.-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5.2

ISBN 7-5057-2077-5

I.旧... II.①刘... ②桂...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343 号

书名 旧影：一代孤高百世师

编者 刘琅 桂苓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规格 635×965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310000字

版次 200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7-5057-2077-5/I. 542

定价 3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回忆陈寅恪先生 / 季羨林	1
回忆汤用彤先生 / 季羨林	9
纪念陈寅恪先生 / 周一良	15
怀念陈寅恪先生 / 俞大维	27
悼念顾颉刚先生 / 白寿彝	32
悼念陈援庵先生 / 白寿彝	38
看完《四库全书》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 / 顾学颉	42
夫子循循善诱人	
——怀念陈垣先生 / 启功	46
三松堂断忆 / 宗璞	59
“最后的儒家”传承的儒家精神	
——回忆当代大儒梁漱溟先生 / 范忠信	63
永怀师恩	
——记受惠于傅斯年先生的一段往事 / 李亦园	74
何莫学乎诗	
——谊兼师友的吴雨增兄 / 萧公权	77
车过古战场	
——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 杨绛	85
京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 王得后	88
王瑶先生杂忆 / 赵园	95
周一良先生与书 / 荣新江	101
纪念沈尹默先生 / 徐开垒	108
师恩深如海	
——纪念金克木先生逝世一周年 / 郭良	113

诗化人生 智者境界	
——敬悼金克木先生 / 李春林	119
金岳霖	
——我最“老”的“老”朋友 / 于光远	122
忆金岳霖先生 / 张岱年	130
忆熊十力先生 / 张岱年	133
熊十力二三事 / 王元化	136
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 / 刘兆吉	139
记终年 / 林斤澜	145
漫说陈虞老 / 唐振常	152
教授与烟斗 / 吴小如	161
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	
——忆雷海宗师 / 何炳棣	164
迟到的讣告	
——悼郑超麟先生 / 张建智	169
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 / 李零	175
永远的张光直先生 / 陈星灿	184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纪念罗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 / 刘小枫	190
沉默的周振甫先生 / 马立诚	197
读信忆旧梦	
——惦念钱仲联先生 / 冯其庸	204
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 余英时	209
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 / 陈来	215
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 / 叶秀山	224
忆朱光潜先生 / 戴镛龄	229
小记黄大师药眠 / 唐振常	233
怀念游国恩先生 / 吴小如	236
若对青山谈旧事	
——怀念朱东润先生 / 潘旭澜	242
关于吾师 / 张中行	248
燕园名师顾随先生 / 周汝昌	252
忆旧二则 / 吴小如	260



学者的风范	
——缅怀黄药眠先生 / 杨占生	263
忆白石老人 / 艾青	268
逸话齐白石 / 黄苗子	273
齐白石衰年变法 / 叶浅予	280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 叶浅予	290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 启功	295
我的老师齐白石 / 娄师白	301
天地一沙鸥	
——怀念恩师蒋兆和先生 / 范曾	306
苍劲乐观人长寿	
——记刘海粟大师 / 赵清阁	310
回忆吴昌硕 / 刘海粟	313
读李德伦 / 黄宗江	318
英灵已作蓬莱客	
——怀念顾毓琇先生 / 张昌华	322
“画坛草寇”叶浅予去了 / 郁风	325
从梦中走出 / 杨苾	329
怀念梅兰芳老师 / 新风霞	334
一个小学生的怀念	
——白尘师周年祭 / 范用	336
名师 / 许渊冲	343
怀念单演义先生 / 王富仁	349
迟到的怀念 / 程正民	354
回忆当年竺校长 / 谈家桢	361
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 / 马国钧	365
中国文化的孺子牛	
——追思熊秉明先生 / 吴为山	376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

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蛊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 Achmid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

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0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复。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就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了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邸中,谈了谈阔别10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

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3年之内，我曾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笈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许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待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治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这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

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迅黄鹄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小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与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

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释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的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

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自己的年龄。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有100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己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我只举一个小例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族类。知识分子有很多特点，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穷”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毛。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统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我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先生的弟子都看在眼里，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1995年12月1日

回忆汤用彤先生

季羨林

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过去80多年的忆念,如云如烟,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烟雾中,却有几处闪光之点,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万,其中有大星数颗,熠熠闪光,明亮璀璨,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晶莹如在眼前。

我对于汤用彤先生的回忆就是最闪光之点。

但是,有人会提出疑问了:“你写了那么多师友的回忆文章,为什么单单对于你回忆中最亮之点的汤锡予(先生的号)先生却没有写全面的回忆文章呢?”这问得正确,问得有理。但是,我却有自己的至今还没有说出过的说法。试想:锡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这个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程度。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没有爆发,但是对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气氛。锡予先生和我都属于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号的人物。我若一写悼念文章,必然会流露出我的真情来。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但是,在那个时代,真感情都会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一旦成了“小资产阶级”则距离“修正主义”只差毫厘了。我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把对锡予先生怀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灵深处。到了今天,环境气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能够把真情实感从心中移到纸上来来了。

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读过的,他的道德我是听说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也崇拜一些别的大师,读其书未见其人者屡见不鲜。但我却独独对锡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像他是一个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绺白须,飘拂胸前。对于别的大师,没见过面的大师,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种深奥难

言的原因。既然“难言”，现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国呆了整整10年之后，二战结束，时来入梦的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了。我必须回国了。回国后，必须找一个职业，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抢一只饭碗”。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饭碗，怎么能过日子呢？于是我就写信给我的恩师、正在英国治疗目疾的陈寅恪先生，向他报告我10年来学习的过程。我的师祖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正是他的老师，而我的德国恩师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学。因此，我一讲学习情况，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他说，他想介绍我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实在是望外之喜。北大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与我本有一段因缘，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梦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我的出国梦已经实现了，阴阳往复，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终究又要回到北大来了。我简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应允。这就是我来北大的最初因缘。

1945年10月，我离开住了10年的“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哥廷根，挥泪辞别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东，到瑞士，在这山青水绿的世界公园中住了将近半年，然后经法国马赛、越南西贡、英国占领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上海。路上用了将近4个月。二战中遗留在大洋里的水雷尚未打捞，时时有触雷的危险。载着上千法国兵的英国巨轮的船员，随时都如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终于靠他们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过了险境，安然抵达西贡。从西贡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飓风，一昼夜，小轮未能前进一寸。这个险境也终于度过了。离开祖国将近11年的儿子又回到母亲怀抱里来了。临登岸时，我思绪万端，悲喜交集，此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变成了瑞普·凡·温克（Ripuan Winkei），满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里，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几天。又转到南京，仍然是无家可归，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睡了一个夏天。当时寅恪师已经从英国回国，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维的官邸中去谒见他。师生别离已经10多年了。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诗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不啻为我当时的心情写照也。寅恪师命我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时校长胡适尚留美未返）。傅告诉我，按照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了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我对此并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龙门了，焉敢还有什么痴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话，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吗？

在南京做了一个夏天的“流动人口”。虽然饱赏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风光，却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疟疾，颇受了点苦头。在那年的秋天，我从上海乘海轮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到了北平。锡予先生让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迎接我们。时届深秋，白露已降，“凄清弥天地，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凄凉中有欣慰，悲愁中有兴奋，既忆以往，又盼来者，茫然懵然，住进了几乎是空无一人的红楼。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杏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 and 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10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30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50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锡予先生开“魏晋玄学”这一门课，课堂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焉能放过！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决定”出来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没有架子的也得学着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有没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锡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